

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

——论凌独见与五四时代

瞿 骏

摘 要 新文化运动在各个地方展开时，吸引了无数追随者进入到这股潮流之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在浙江一师的“非孝”之争中，施存统等“新青年”的对手方——凌独见是以“卫道守旧”之形象展现在新旧分明的历史叙述之中的。但若征诸凌氏生活与思想的演变轨迹，其实他并非“卫道”青年。凌氏与“新文化”主流之间是一种既迎合又排拒的复杂联系，这种联系深刻揭示了边缘知识青年在五四时代里跌宕起伏的生命境遇。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凌独见 失语者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4-0158-11

新文化运动在各个地方展开时，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进入到这股潮流之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免成为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失语者”，凌独见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尚不算于史无闻，常常出现在关于浙江、关于杭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在这些叙述里，凌氏独立执笔《独见》周刊^①，写文章与施存统等新青年“作战”。但吊诡的是同样在那些历史叙述里，凌氏好像仅仅是作为一个“非孝”之争中的“卫道青年”而存在的。他作为具体个人的种种，我们却几近一无所知。不少关于凌氏的已有成果都既不知其早年，也未读过《独见》周刊，但在缺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人其刊的议论倒是不少。^②即使有研究者可能读过《独见》周刊，但囿于新与旧、激进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的固化分类而导致其所论去历史真相甚远。^③而利用各种零散史料来重整和探究凌氏言行引发的反响和凌氏离开一师后的生命轨迹的研究则几乎未见，因此这些问题或都有进行厘清的必要。^④

这些问题的厘清除了事关凌独见这一具体人物外，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五四时代”。在五四时代读

① 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由凌独见包办的是第1、2号。

② 如有研究指出：“凌独见在五四时期是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那时的学生都是趋新族，而他反对白话文，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这本刊物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这样一个守旧之人，也以迅雷之速，几乎与胡适同时出版白话文学史。”方长安：《新诗传播与构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这段文字若苛刻一些说句句皆错。《独见》全用文言文这一“迷思”大概出自阮毅成，参见阮毅成：《杭一中与杭一师》，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③ 如有人说：“凌独见实际上是反动派打进一师进步阵营的一个卒子，他的《独见》是他们妄图用来射杀新文化的一支毒箭。”董舒林：《“浙一师学潮”的前前后后》，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1辑，杭州：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2年，第118页。

④ 就笔者所见大概只有马楠的论文《觉醒抑或迷失？——“五四”前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风和众生相》（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对施存统和凌独见之间微妙的关系和他们特别是施存统“新旧互渗”的思想做了较为出色的分析。

书人的竞争当然不乏酷烈的一面，但它与戊戌时新旧之争的最大区别是，当年属于“旧派”的读书人是要杀人“翼教”的，所以杜亚泉才会说：当时“新旧”二字“意义本极单纯”，“以主张仿效西方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①

可到五四时代“天下为学说裂”^②，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趋新”只有程度之差，而无本质之别。^③在杜亚泉眼中“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已被看作为“旧”。^④而茅盾则不认为“鸳鸯派”的出版物可代表“旧”，因为它们“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⑤在新旧纠缠难辨，“主义”的时代又未真正来临之前，此时的读书人之间的纷争离合该如何理解，则是本文想要讨论的另一个大问题。^⑥

—

凌氏本名凌荣宝，浙江衢州人^⑦，有说其眇一目，故号独见^⑧，其家出身为小业主，开一家规模不大的柴炭店。^⑨据其自述，《青年》杂志创刊那一年（1915）他已写了不少“卑劣得很”的白话诗。^⑩大概1919年，凌氏进入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在一师属于“二部”学生即非师范本科，而是中学毕业或小学教师来校培训一年者。^⑪因在“二部”低人一头的缘故，凌氏在一师本默默无闻，他在学校的脱颖而出始于执笔批驳《非孝》的《独见》周刊。

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独见》周刊现存第1—4号。虽然笔者仍在查找原刊，但《介绍》中已有《独见》周刊第1—4号的目录，并引述了不少其中的文字。这些文章，可以肯定未用文言写作，而且凌氏文章之“新”相较于其对战的“新青年”们实基本无差。

如凌氏在《独见》发刊词中说：“我……也不征求父母师友的同意，也不经过官厅的许可，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发行这张出版物。……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要变他为光明，我以为只有教育这条路。有了教育，什么真理啊，人道啊，一齐涌现眼前了。至于平等，自由，博爱，互助等，也尽在其中了，不过我程度很浅，能力很薄，又在求学时代，还要请大家本了互助的精神来指教我才好，研究教育道德，是我的主要旨趣。”^⑫他又说：“在德谟克拉西的时代，在报纸上面，专门研究如何专制，军阀的目的和方法，或者在国界还存在的日子，在杂志上面，一味研究卖国的方略，这都是荒唐之极的。主张非孝一文，又何异于是”；“我以为孝有广义狭义之分别；善事一己的父母，是狭义的孝，善事全社会的父母，是广义的孝。新

① 佺父（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1919年），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8页。

② 宋育仁：《箴旧砭时》（1922—1923），王东杰、陈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宋育仁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1—212页。

③ 余英时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人建立一种理论，主张保守中国传统不变，并拒绝一切西方的影响。从所谓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到全盘西化论、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样‘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34页。

④ 佺父（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1919年），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第498页。

⑤ 沈雁冰：《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号，1922年11月10日。收入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06页。

⑥ 若“主义时代”来临，读书人之争的排他性和残酷性从1925年底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即可见一斑：“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元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毁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胡适：《致陈独秀（稿）》（约1925年12月间），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7页。

⑦ 毛忠兴：《江山旅杭同乡会》，政协浙江省江山委员会秘书处浙江省江山县委志编纂办公室编：《江山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第36页。

⑧ 会林、绍武：《夏衍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⑨ 阮毅成：《杭一中与杭一师》，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第48页。

⑩ 凌独见：《国语文学史纲》，出版机构不详，1922年，第336页。

⑪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1900—197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董舒林：《“浙一师学潮”的前前后后》，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115页。

⑫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536页。

伦理的孝，是广义的孝。广义的孝，换句话说，就是博爱……从社会方面说，子不孝亲，是社会最大的障碍，现在研究社会的科学，一天发达一天，我们都晓得社会是个人与个人互相扶助的，不孝自己的父母，焉能帮助别人家。”^①

这些话基本都是针对施存统《非孝》的大意而言。《非孝》的原文现在似已不存，但据1920年施氏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文章则概括为：“‘改造社会非从根本改造不可’，所以我的非‘孝’，目的不单在于一个‘孝’，是要借此问题煽成大波，把家庭制度根本推翻，然后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人类是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当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②

从这段引文不难看出施存统和凌独见的观点表面看似对立，但却分享着五四青年的相同预设，比如关注社会的研究和改造，肯定新伦理，特别是平等、自由、博爱、互助等。区别在于，施存统求的是一个“根本改造”，而凌独见此时似寄望于“教育”的改良，所以凌氏文字大概算不上真正的“翼教”文字，但同时它又不属于新文化最激进的层次，而是“居中”的层次。^③而正因为其“居中”，当时不少人如吴芳吉就相当欣赏和认同《独见》与凌氏其人。^④

在时人的欣赏与认同下，《独见》就并非凌氏“自娱”之物，其创刊号1000份很快就卖光了。^⑤而且买来阅读之人也并未将《独见》划入“反新文化”的行列。1921年浙江新滕小镇上的“新人物”竺饮冰家就有很多供同好外借阅读的“新杂志”，其中就既有《浙江新潮》，又有《独见》。^⑥

同时我们亦可发现《浙江新潮》和北京《新潮》上那些极度激烈的文字，经常会有与凌独见相似的“居中”论新文化者来表示不同意见，有人就说：“讨论问题，当得先从切要入手，像《浙江新潮》里的《非孝》恐怕太早一点。而且因此断送了他的生命，我很可惜他……我看见《新潮》第二卷第一号里，登了一张骂人的广告，我没有见《新湖南》里说的什么样，但是究竟我们少年火性太重一点，我看见了那广告起了反感，也许是火性太重的缘故。火性太重不很好的，我们总要自己学着，自己反省一遍。”^⑦

以上都可说明凌独见在新人物中既追随时潮，但又不太激进的大概位置。这一位置让他较成功地建构起了自己在浙江省的一个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中对凌氏来说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剑丞）。1920年夏氏曾专门写信给张元济为凌氏做推荐，说他是“浙江师范毕业，续往龙门师范，今年毕业，善白话文”。^⑧这句话相当程度上说明了夏氏知道凌独见属于“趋新”一路，但并不以此为嫌，仍大力推荐之。不过对夏敬观的信，张元济似未有积极回应。由此说明凌独见尚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在更大舞台上立足，而其证明的利器依然是“新文化”。

1921年9月17日由夏敬观牵线，凌独见成了浙江省教育厅的办事员。^⑨11月凌氏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办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册），第432、433页。

② 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我》，沈自强主编，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一师风潮》，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6页。

③ 最“激进”的层次用《钱江评论》的发刊辞来说是：“近来颇有一般冒充新牌子的人说：‘我们都是新的，你们太新了！’又有人说：‘思想是要新的，但是要在轨道以内，出了轨道以外，那就不是新思想了！’我们却以为新思想只有真不真，彻底不彻底；不能没标准的说什么太不太，没界限的说什么轨道以内，轨道以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592页。

④ 《吴芳吉日记》1920年4月1日条，吴芳吉著，傅宏星编校：《吴芳吉全集》（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76页。

⑤ 董舒林：《“浙一师风潮”的前前后后》，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116页。

⑥ 竺家所藏具体书目为《少年中国》（1卷1号起至12号）、《少年世界》（1卷1号起至12号）、《新潮》（1卷1号起至5号）、《新青年》（7卷全）、《新人》（1号至8号）、《小说月报》（11卷全）、《新妇女》（1卷2、3号、4卷4号，陆秋心主编）、《新的小说》（1、2号）、《妇女杂志》（本年3、4号）、《劳动界》（2号起至15号）、《礼拜六》（第101期）、《新平潮》（1、2期，平湖新平潮社编）、《新民》（1、2期，石湾新民学社编）、《解放与改造》（1至8号）、《教育潮》（1卷3号至6号，浙江省教育会）、《曙光》（1卷3、4号）、《医事月刊》（1卷全、2卷1至3）、《新乡人》（第3期，乌镇新乡人社编）、《家庭研究》（1、2、3）、《新浙江》（第1号，张静庐主编）、《独见》（1册，凌荣宝主编）、《钱江评论·附：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社）、《每周评论》（2册，胡适之）、《星期评论》（1册，戴季陶）。参见《借书约》，《新滕半月刊》第7期，1921年5月16日，第1版。

⑦ 东京S生：《寄给北京一个朋友的信》（续），《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4日，第4张第2版。

⑧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张人凤整理，1920年10月9日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3页。

⑨ 《厅令》，《浙江教育月刊》第4卷第9期，1921年，第2页。

的第3届国语讲习所。在讲习所内，凌独见做过黎锦熙、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大家的学生。^①其中胡适主讲的科目是“国语文学史”，这为日后两人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1922年3月浙江省教育会办国语传习所，请凌氏讲国语文学史，省教育会之所以请凌氏和他参加过教育部办国语讲习所密切相关，他已是省内的“国语专家”。^②既要讲国语文学史，则需要编讲义，当年凌独见就编出了讲义，并在讲义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国语文学史纲》。

这里出现了一个疑问：凌氏既已在北京听过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课，且讲义“胡适之先生已编到十四讲了，大可拿他来现成用一用”。那么凌氏为何不用，却要“另编”呢？这源于凌氏在国语文学史的写法上和胡适意见不同。在写作起点上，胡适主张从汉朝说起，凌氏却主张从唐虞说起；在分期上，胡适分两期：北宋以前为第一期，南宋以后为第二期。凌氏分四期：自唐虞到周为第一期，自秦到唐为第二期，自宋到清为第三期，民国以后为第四期。^③

那么《国语文学史纲》究竟和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讲义”是何关系呢？若粗略地看，《国语文学史纲》开篇就已提出与胡适针锋相对的意见。而且序言是两个“大旧派”夏敬观和马叙伦所作。其中马叙伦经常被新青年们，尤其是鼎力支持胡适的顾颉刚、傅斯年等冷嘲热讽，大肆漫骂^④，因此两书好像是对立的关系。

但若继续细读，我们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夏、马二人的序言均对《国语文学史纲》吹捧了一番，但都有大而化之，不着边际之嫌。^⑤这表现出二人未必认真读过此书，也未必认同所谓“国语文学史”的写法。同时凌独见的看法大概也与作序二公相左，除了开篇的挑战性意见外，《国语文学史纲》在很多地方实际承袭自胡适。徐雁平的研究就指出：“此书第二编最能见胡适《国语文学史》的要义，如‘国语文学史的范围’‘为什么要研究国语文学史’‘国语文学与科举制度’‘国语文学史从哪里说起’等数章，基本是胡适讲义的翻版。”^⑥

除了在框架和思路承袭胡适外，《国语文学史纲》处处能见到凌独见读新文化主流书刊的痕迹。如他说：“《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登着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东西，是白话文运动的第一次宣言书。《新青年》的第二卷第六卷（应为号）上接着又发表了一篇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到了七年四月就是《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胡适又发表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自从这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学会上引起了一个极大的波澜，当时杂志这一类书很少，《新青年》在当时，社会上很欢迎。自从新文学运动的旗帜竖起，表同情的固然很多，反对的亦是不少，因为有了反对的和赞成的二派，便起了争论，于是白话文，就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结果，白话战胜文言，到现在凡是新出版的印刷品，差不多都有白话了。这里因为例太多了，反而有些不便举，所以只好举出几部书出来，介绍一下，就算完了。中华书局里有《国语文类选》，商务印书馆有《白话文范》，世界书局有《新文精华》，这三部书是从各书报里面搜集拢来的，里面都是当代第一流的文章。”^⑦

这一年（1922）《杭县教育杂志》上还有一篇凌氏的文章也直接夸赞胡适解释文学的话说得好，并引胡适的话说：“《石头记》《水浒传》等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由教员指导他们看。”^⑧此语出自《中学国文的教授》，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

① 据黎锦熙说：“国语讲习所是两个月毕业的，过了年，不久就举行毕业式。”黎锦熙序，胡适：《国语文学史》，北京：北京文化学社，1927年，第1页。

② 除了“国语文学史”外，凌独见亦要讲“国语教学法”。《杭州快信》，《申报》1922年2月8日，第十一版；3月14日，第十版。

③ 凌独见自序，凌独见：《国语文学史纲》，无页码。

④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册，1919年1月4日、1921年11月4日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43、179页。傅斯年：《出版界评》，《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35页。据顾颉刚说：“马（叙伦）与孟真了无关系，竟在《新潮》杂志上大骂一顿，《新潮》销场愈好，马氏名誉愈坏，岂有不怨恨入骨之理。”顾颉刚致叶圣陶（1919年6月17日），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5页。

⑤ 夏敬观序、马叙伦序，凌独见：《国语文学史纲》，无页码。

⑥ 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⑦ 凌独见：《国语文学史纲》，第333、334页。

⑧ 凌独见：《儿童文学与小学管调》（1921年3月12日），《杭县教育杂志》第1期，1922年，第21页。

9月)。^①这又证明了凌氏非但常读《新青年》，且深受影响，不到半年就能将其中的内容引入到自家文章中去。因此凌氏要夏敬观和马叙伦作序，不过是希望借助二人的名气和在浙江省内的势力。钱玄同看出了此点，说：“书首有前后两个浙江教育厅长的序，即此一端已足见其鄙陋可晒了。”^②

1923年2月凌氏的《国语文学史纲》改名《新著国语文学史》出版(以下简称“凌著”)。此次出版凌著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一是由小出版社变成了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发行。二是在原来“旧派”夏敬观、马叙伦的序之外，特别加上了“新文化大家”黎锦熙的序言。值得注意的是黎序对凌著几乎没有肯定性意见，不过说自己“大略地翻了一翻”，觉得仅是一部“读书录”。^③这种保留当然是有深意存焉的。三是商务印书馆将凌著从讲义变为“中学用书”，广告吹嘘说是“材料丰富得未曾有，为中等学校最切用之教本”。^④

凌著既由小出版社改为大机构出版，其引发的关注和波澜就不是当日可比的了。1923年2月26日，钱玄同已在日记中抱怨：“有浙江师范毕业生凌独见者，编了一部《国语文学史》，芜杂谬误，触目皆是，真是胡闹，现在居然由商务出版了！足见商务方面没有识货的人——这话错了，他们本来只希望赚钱，哪有闲情别致去顾管内容的优劣呢！”^⑤1924年8月7日《晨报副刊》发表章衣萍的长文，直指凌著是一部糟糕的国语文学史。^⑥章文一出，8月12日《晨报副刊》有署“直陈”的文章回应章氏的意见。^⑦之后，各种对凌著的批评意见层出不穷。^⑧而在这些批评意见背后处处都浮现着胡适的影子。

凌著水准平平，在不少地方剿袭胡适，胡适的朋友和弟子们围攻非议之并不奇怪。不过说他人“文学史”水准不够似是当时的一个常态。像谭正璧说凌独见“差误百出”，却很同意凌氏说“太古至唐虞文学”的观点。^⑨浦江清则进一步指出：“关于中国文学史之著作，数年来所出虽多，惬意满意之作实少……谭正璧书，道径未误，而疵谬百出。”^⑩且当时剿袭或参考胡适的并不止凌独见一人，曹聚仁的《中国平民文学概论》与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都能明显地看出(胡适)《国语文学史》的思路”。^⑪因此除了讨论凌著本身的是非之外，凌著和凌氏其所反映的五四时代各种复杂面相可能是更需要分析的问题。

二

从前文不难看出凌氏无论从其家庭出身、还是教育程度都属于五四时代里“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青年”，^⑫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正能满足他借此来“社会上升”的需要，他也努力掌握了其可能寻觅到的“新文化”资源。这说明对于五四青年特别是边缘知识青年来说，以德先生、赛先生、穆姑娘等为代表的启蒙概念、知识与思想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吸引力，但更大的吸引力来自这些概念、知识与思想在他们人生道路中的“形形色色的使用”。王汎森即指出：“人们为何接受一种思想？除了思想是否高明与是否具有说服力之外，情境的仿佛性、现实的需要和个人利益都不可忽视。思想、学风与现实利益，有时并不互相排斥，思想、学风常常靠着现实利益而伸张，思想常常乘着现实之

① 此文在《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二集(1920年3月)另有一同题讲演记录稿，内容颇有不同，而此段引文仅见于《新青年》。

②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1923年2月25日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16页。

③ 黎锦熙序，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④ 《教育杂志》第15卷第4号，1923年，广告页。广告，《申报》1923年3月16日，第三版。按想使自家的“新文化”书成为教材是当时新人物的较普遍心理，1923年创造社同人编的新诗集《辛夷集》的编辑大意就直接说“本集取材长短适宜，尤可供男女中小学国文教科之用”，第90页。孙俚工编的《新文艺评论》其广告亦说此书“可作研究新文学者的指南，为新学制高中一二年级的良好国文教材”。见吴子垣编：《玄庐文存》，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广告页。

⑤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1923年2月25日条，第516页。

⑥ 章衣萍：《糟糕的国语文学史》，《晨报副刊》1924年8月7日，第三、四版。

⑦ 直陈：《糟糕的国语文学史》，《晨报副刊》1924年8月12日，第四版。

⑧ 参见长风：《是李颀底渡汉江吗》，《现代评论》第2卷第52期，1925年12月5日，第21页；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第386页；胡云翼：《新著国语文学史》，北京：北新书局，1932年，第3页。

⑨ 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初版于1925年)，第19页。

⑩ 浦江清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⑪ 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第176页。

⑫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翼而前行。”^①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重新理解“非孝”之争背后的凌独见们和施存统们的行动及其背后的动机。对于他们来说，比理念之争更重要的或是吸引新文化大家的注意，获取社会的关注，积累自身的声名，按照顾颉刚的说法是“依草附木，标榜名声”。^②曹聚仁、周伯棣等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均说：“《浙江新潮》的思想是《新青年》思想的幼稚复写”；^③《非孝》则“都是一些空洞的话，不过是从《新青年》里偷得一些浅薄的见解，加上一个吓人的题目”。^④而之后，“陈独秀替施存统作声援，来了一封长信；戴季陶替凌独见撑腰，也来了一封信。其实，大家对于新文化是不够了解的”。^⑤更进一步讲，这批从浙东僻壤走出的五四青年，经过五四之一“动”，至少基本远离了原来命定的回山区家乡担任穷教书匠之路，从此时开始，他们拥有了走向全国舞台的可能性。^⑥凌氏的生命轨迹符合前述之逻辑，施存统等亦是如此。^⑦

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北京政府当时虽弱势，但亦为合法的中央政府，其信息发布特别是教育部的部令章程，作为一套“指令系统”，对于新文化运动有超乎我们以往想象的重要影响。这套指令系统因民初政局的复杂性而善变、快变、多变，有时其是保守的，逆潮流的，有时其是顺应时势的，有时则是大大超前的，超前到经常出乎新文化运动“旗手”们的意料。1919年底蔡元培不过是听说“教育部决定中学国文兼采白话文”，就觉得“将来白话文的发达很有希望了”。^⑧到民国九年（1920）教育部颁布的竟是公布《国音字典》和小学教材改语体文的通令。

对于这些超前的部令章程，各地的五四青年们都会把它们当作政府强力推行新文化的讯号，而这些讯号对他们来说就可以“借新思潮做出人头地的阶梯，借新思潮做自己地位的护符”。^⑨凌独见正是从以“善白话”开始几乎谋事成功，依靠“国语略有研究”参加教育部办国语讲习所，然后凭借此项本领畅行省内，进而又有了编国语文学史讲义的好机会。同时又正逢商务、中华等巨鳄都欲抓住国语、国音等新文化向地方推行之商机，凌著遂能乘势而生。^⑩

若将视野继续扩大至与凌著相关的人与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新诗”等各种新文化，当时既已形成一明显的主流，但同时各家又处于一竞逐的过程之中，在此场域中读书人的行动和心态一方面具有相当的“态度同一性”，但另一方面也可区分出微妙而纠缠的各种层次，此问题牵涉太大，这里只处理两个问题：一个是胡适对于凌著这种貌似挑战性著述为何这样处理和其背后的心态；另一个是凌独见式的读书人如何来因应新文化之主流。

从前述章衣萍的文章看，胡适是第一时间寻了凌著来读。在那段时间，胡适正好在全力以赴地修改并宣传自己的国语文学史。^⑪据1928年胡适《白话文学史》的自序说：

民国十年（1921），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我去讲国语文学史。我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

①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序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18页。

② 顾颉刚致叶圣陶（1921年5月28日），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70页。

③ 周伯棣：《“五四”前后在杭州》，收入《浙江一师风潮》，第406页。

④ 曹聚仁：《笔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324页。

⑤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20页。

⑥ 参见 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且需注意这种痕迹一直刻在他们的心中，且时有显现，曹聚仁在给胡适的信中就称自己是“浙东金华之无知小儿”，又说自己“生在穷乡僻壤，少师友见闻之益”。曹聚仁致胡适，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500、506页。

⑦ 石川祯浩特别指出“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发表《非孝》一事，使施存统在中国声名远播”，尽管留学日本，但经常收到中国各地无政府团体的来信，而且施氏是由戴季陶送到日本读书，“每月资助学费五十元左右”。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7、290页。

⑧ 《蔡子民先生莅我校国文部之演说》，《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一集，1919年12月，第4页。

⑨ 丁晓先：《新时代的危机》，《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4日，第四张第一版。

⑩ 据1925年商务印书馆在《民铎杂志》上的广告，其关于国语、国音的图书、教具几近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广告，《民铎杂志》第6卷第5号，1925年5月1日。

⑪ 如《晨报副刊》1922年12月1日发表《南宋的白话词——国语文学史的第三篇第五章》，第9—12版。《时报世界周刊》第23—25号上发表《国语文学史的绪论》，转见《学生杂志》第9卷第2号，第160页。《三国六朝的平民文学——新著国语文学史的第四章》则发表在《国月月刊》第1卷第2期，1922年，第1—6页；《晨报副刊》1922年12月2、3、5日，均为第1版；《绍兴教育界》第1卷第1期，1922年，第1—8页。

义,约有八万字,有石印的本字……次年(1922)三月廿三日,我到天津南开学校去讲演,那晚上住在新旅社,我忽然想要修改我的《国语文学史》稿本,那晚上便把原来的讲义删去一部分,归并做三篇……但这个改革还不能使我满意。次日(3月24日)我在旅馆里又拟了一个大计划,定出《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这个计划很可以代表我当时对于白话文学史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加上汉以前的一段,从《国风》说起,但这个修改计划后来竟没有工夫实行。不久我就办《努力》周报了;一年之后,我又病了。重作《国语文学史》的志愿遂一搁六七年。……前两个月,我有信给疑古玄同先生,说了一句戏言道:“且把上卷结束付印,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十年”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旧例,却不料玄同先生来信提出“严重抗议”,他说的话我不好意思引在这里,但我可以附带声明一句: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①

这段自序隐含的对手方,或正是凌独见等其他“国语文学史”的作者。仔细品味有数层深意存焉:第一,“我”做国语文学史实比诸位都要早,特别是凌独见的国语文学史,既听过“我”的课,大概难逃暗袭“我”在国语讲习所的讲义之嫌;第二,“我”的国语文学史早有加上“汉以前一段”的设想,不过是未付诸实际写作;第三,“我”的文学史“后出”是因为琐事缠身,无暇去做。第四,“我”的文学史不会再如《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只有上卷,几年内将成完璧。^②

这几层意思都显示了胡适对于各种早于其出的国语文学史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国语文学史大概是胡适心中相当看重的自家著作。这一点梁启超看得明白,他在评点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即指出“如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③因此面对凌著开门见山的“挑衅”胡适基本可以肯定是心中不满,并会酝酿以各种方式“猛烈开炮”,所以他才会说:“糟糕,商务印书馆竟出版了这样的书!”^④但另一方面,作为实际后出的国语文学史,胡适似又未完全修正凌著的“挑衅”意见,反而试图把写作起点推至“汉以前”。当然同为“汉以前”,自“唐虞”说起与从诗经开始说起,意义大不一样。起自“唐虞”在时人心目中是好古的象征。直接从诗经讲起则是胡适自《中国哲学史》起开始的“新做法”。^⑤在分期上胡适虽未明说,但也有意加上“金元的白话文学”“明代的白话文学”“清代的白话文学”“国语文学的运动”等章。^⑥

其实早在1921年12月,钱玄同就对胡适《国语文学小史》做评论道:“国语文学,应该从《诗经》的《国风》讲起……你说‘《诗经》到了汉朝已成了古文了,故不能不将他撇开’,这话我不赞成。”^⑦胡适对钱氏的意见并不反对,其回信说的是并非不想前推,而实在是“时间不够”:

我躲了一点懒,你偏不许我躲懒,真是岂有此理!……《诗经》确应该收进去,但此一篇很不容易做。等此书写定付印时,我一定加上一篇,也许不止一篇,或须三四篇。大旨是:(1)《诗经》的白话文学……你出了这一个难题,怕要耽误此书出版的年月了!^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凌独见对胡适“只从汉朝说起”的批评正挠到胡适的“痒处”(胡适亦认为确不应只从汉朝说起),当然同时亦是他的“痛处”(文学史写作的向前推进耗时费力)。而真正对胡适的文学史特别是《白话文学史》点中要害的批评乃是:

胡先生在这部书里因为他处处要替白话文学找历史的根据,所以有许多地方是不顾及整个的叙述;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这种错误,譬如著现代文学史的人,他不叙述有意识的作家创作出来的小说、新诗、散文,偏重在皮黄梆子以及时行小调和大鼓书词的搜求,这种研究文学史方法的错误,就是胡先生也

①⑥ 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自序,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1—6、11—12页,第5—6页。

② 按《白话文学史》的命运和《中国哲学史大纲》相同,中、下卷一样难产。1934年10月商务印书馆重出《白话文学史》,仍然只有上卷,时光荏苒,此时距离书的初版已过去6年零4个月矣。

③ 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④ 章衣萍:《糟糕的国语文学史》,《晨报副刊》1924年8月7日,第三版。

⑤ 此点蒙王汎森教授提示,特此致谢。

⑦ 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12月7日),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104页。

⑧ 胡适致钱玄同(1921年12月10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295页。

⑨ 不过胡适只是试图“前推”文学史而已,“成品”并未“前推”,因此浦江清就认为《白话文学史》“前后均缺,未成全书”。浦江清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130页。

首肯吧。^①

这些意见恰恰是胡适绝不会“首肯”的!^②

以上所论的胡适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千万凌独见式的地方读书人所塑造的。在新文化运动如大风展开全国的数年间,“新派人物围着他(胡适)打转,而不满他人在各处极口谩骂,举国对胡适嫉妒交加,处处留意他的新作,而又时时想修正胡适这个或那个观点”。^③此种“嫉妒交加,处处留意”的状况既巩固加强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里的中心地位^④,但同时也造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好几个相当吊诡的面相。

第一个面相是著述“生意”与著述口碑的分离。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主流大家的著述当然都极其畅销,但凌独见、谢无量、胡怀琛、曾毅等人的著述销量恐怕也并不差,尤其是当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在哪儿买”还回答不上的时候。^⑤凌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广大的地方读书人眼里是足够唬人的金字招牌。它1923年2月初版,6月即再版,速度已是相当的快。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上册,半年之内再版,郑氏已说:“这是谁也梦想不到的事!”^⑥何况凌著是“中学用书”,章衣萍就担心读中学的弟弟“也许要上凌先生的当了”^⑦,这都证明凌著或许能销量可观。而在中华书局老人的回忆中,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卖得很好。^⑧周作人则听“南边来的朋友”说过:那里的中学生很欢迎胡寄尘(怀琛)的诗,“以为与古诗相近所以有趣”。^⑨

不过上述著述的“生意”和口碑却不太一致。因为新出版物的口碑或由新文化的主流势力来评断和掌控,但商务、中华等出版业巨头仍掌握于张元济等“老新党”之手。尽管“在商言商”,由新文化拓展出的商机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追赶,“北大之与商务,实已打成一气”,^⑩但受制于“做生意”还是“做吾家书”的矛盾,新文化的主流势力并不能完全掌控商务、中华。商务、中华做什么样的出版物最大着眼仍在于“销场”,并且是即时的“销场”。这一点顾颉刚就在给朱经农的信中有过大抱怨:

商务中每虑好书不易得好销场,这完全是眼光太近之故。实际上,凡是好书,都有永久的价值,一时的生意固未必好,但“月计之而不足,年计之而有余”了。……适之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也是专门书,但何以六七年中重版了六七版呢?再看他们自编的应时的书,廿五年之内出了多少,但永久重版下去的有多少种呢?我听得张菊生先生说:“《小说世界》固然坏,但人家知道它坏的时候,我们的生意早做着了。”这话是辗转听来的,不知道真不真,但我听了不得不使我对于商务馆起了很高的恶感。我想,有了商务馆在出版界的地位,不肯好好去做,反以欺骗为得计,中国的文化要斫丧于彼辈之手了。张先生是翰林,是从

① 张大东:《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国闻周报》第6卷第22期,1929年6月9日,第8页。

② 这种意见若继续演变会成为胡适“落伍”的依据。1934年茅盾即说:“他(胡适)从‘建设国语文学’这个口号里‘发见’了一个新东西:替白话文学编家谱,证明它也是旧家子而不是暴发户。他这‘伟大’的工作开始于民十左右,完成于民十七或十八。这就是他的半部《白话文学史》。……他努力要‘证明白话文学不是暴发户’这一件事的‘动机’却是从进攻到退守,从斗争到妥协;因为那时候‘白话文学运动’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争取确定的权威,而不是皇皇然告白自己也是旧家子。一种新兴的运动应该是‘创造的’,用不到抬出家谱来夸耀。何况又认错了祖宗!胡先生一方面要我们去跟易卜生、莫泊桑认同宗,一方面又叫我们去认封建时代的隐逸诗人、田园作家为高祖,为高高祖,倘使死鬼有灵,一定要骂胡先生‘乱宗’。胡先生同时也把‘文白之争’的阵线搅浑了!《新青年》初期的‘文白之争’同时也就是新旧思想之争;到了胡先生专替白话文学编家谱的时候,所谓‘文白问题’就只成为单纯的文字问题了!于是‘五四’的白话文学运动失却了新兴运动的意义,于是表面上退让的封建文学却暗中得了胜利了!”茅盾:《对于所谓“文言复兴运动”的估价》,《文学》第3卷第2期,1934年8月1日,收入韦韬、陈小曼编:《茅盾杂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30—331页。

③ 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

④ 如陆侃如曾向胡适描述过他对《白话文学史》欲购而未得的焦急心情:“为买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一天总要上一次‘新月’,他们说话也不可靠,今天去,他说明天有,明天去,他说后天有,甚至上午去,他说下午就有,从十五号到今天十九号,还是没有出来。大概到端午节总该装订好了罢?”陆侃如致胡适(1928年6月19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4册,第614页。

⑤ 此语出自钱玄同。钱玄同致胡适(1927年8月2日),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第117页。

⑥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下),序言,收入熊飞宇编:《郑宾于文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

⑦ 章衣萍:《糟糕的国语文学史》,《晨报副刊》1924年8月7日,第四版。

⑧ 朱联保:《在中华书局当练习生的情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98页。

⑨ 式芬(周作人):《新诗的评价》,《晨报副刊》1922年10月16日,第四版。

⑩ 顾颉刚禀父(1922年12月2日),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页。

前的新党，若竟说出这话，使我看他比一般的市侩更可鄙薄了。^①

加上凌独见、胡怀琛等都直接挑战过胡适。谢无量则无论在诗作和中国哲学史上都曾遭到过胡适的“进攻”，之后他也曾借《楚词新论》等著作做反击^②，所以这些实际上卖得不差的著作就屡屡成为新人物批评的标靶。像章衣萍在批评凌独见的同时，就要捎带上谢无量等，说他们“头脑不清”“没有做中国文学史的资格”。^③胡怀琛的《大江集》被周作人说成“复辟派的‘国学家’”的“门人爱读的书”。^④同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楚词新论》也被《清华周刊》的文章评为“这样骇人的结论，这样薄弱的根据，我们不能不惜作者之大胆武断了”。^⑤

第二个面相是因竞争反而“使得一个时代的思想愈来愈相像”。^⑥诸多地方读书人，有的是通过迎合追赶新文化运动主流来出人头地。有人即说：“适之先生自从提倡文学革命以来，风头出得十足，惯受人家恭维的，一般崇拜新偶像的青年（我也是其中一分子，诸君不要动气。）拿他的话当做金科玉律。”^⑦而另外有一批地方读书人，则是通过“修正胡适这个或那个观点”来反向赢得关注，凌独见、胡怀琛、谢无量等人均有这样的表现。但正和凌独见的国语文学史实在不少地方得自胡适一样，胡怀琛与胡适关于新诗的讨论，谢无量与胡适对于文学的见解其实也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像胡怀琛就曾列举新体诗四项之长有：（一）新体诗为白话的，能遍及各种社会，非若旧体诗为特别阶级之文学也；（二）新体诗是社会实在的写真，非若旧体诗之为一人的空想也；（三）新体为现在的文字，非若旧体诗为死人的文字；（四）新体诗是神圣的事业，非若旧体诗为玩好品也。^⑧而且这些人的著述都出现了因要“修正”、因要“竞争”反而更加趋同的现象。这种趋同的现象一方面表现在各种新书的广告中，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读书人的个人写作之中。

就广告而言，书商以新文化为趋利之源，他们的努力方向不是求竞争之异，而是找卖点之同，因此在广告中基本看不到竞争性、层次性和差异性，而满眼都是生意与新文化结合后滋长出的重重诱惑。像胡怀琛《大江集》的广告就说：“胡先生的诗派。能融化新旧。博采众长。自成为一种特创的新诗。本集除胡先生自己创作之诗而外。又有英、法、美各国诗译文及原文。用中、英、法三国文字合刊的诗集。也要算这是第一部。此外再有附录三篇。详论诗理。是胡先生的特别卓见。有志新文化的，一读此书。便可彻底明白诗是甚么。”^⑨又如泰东图书局出过一本《当代名人新体情诗》，其广告一面以情诗为吸引，一面将稍和新诗沾边的大小名人都放在了一处，说：“本书由诗学大家浦方亮先生手辑，内容作者多一代名人如胡适之、胡怀琛、吴芳吉、刘大白、刘半农、沈玄庐、沈松泉、张静庐、黄日葵、王统照、周瘦鹃、吴江冷、李妃白、曹靖华等三十余人诗，所选诗二百余首，无句不香，无语不甜，洵研究新诗者之模范，亦天下有情眷属青年男女不可不读。”^⑩

就个人写作看，1922年顾颉刚认为胡怀琛是“方趋时髦，为《新文学批评》及《大江集》等书”。^⑪这种“趋时髦”的心态在1926年胡氏的《新诗丛稿》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一面似乎忘了自己几年前在《晶报》《最小》等“鸳鸯派”报刊上对“新文化”的冷嘲^⑫，又将数度热讽过他的对手胡适写的白话诗——“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郑重印在书前，以示自己与胡适关系亲密，进而凸显他在新诗界宛若

① 顾颉刚致朱经农（1923年6月3日），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34—135页。这封信顾颉刚在开头特别说：“上面一信是先生可以公布的。余外有些不能公布的话，写在此纸。”

② 谢无量：《楚词新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3—31页。

③ 章衣萍：《糟糕的国语文学史》，《晨报副刊》1924年8月7日，第四版。

④ 式芬（周作人）：《新诗的评价》，《晨报副刊》1922年10月16日，第四版。

⑤ 铨：《中文书籍介绍》，《清华周刊》1924年第10期，第19页。

⑥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序论，第18—19页。

⑦ 佚名：《对于胡适之通信的意见》（1920年5月13日），收入胡怀琛编：《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上），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第56—57页。

⑧ 胡怀琛：《大江集》附录，自印本，1923年，31—33页。

⑨ 广告，《申报》1921年6月9日，第17版。

⑩ 广告，《申报》1921年10月12日，第17版。

⑪ 顾颉刚致蔡元培（1922年2月3日），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45页。

⑫ 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就是《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晶报》1921年8月1日），转见《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64—165页。

与胡适相接近的地位。^①

谢无量所著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本书初版于1923年，标题就颇追赶时风，其概括罗贯中的思想特色为：一，平民革命主义、二，武力超人主义和好汉结社主义、三，种族自尊主义、四，女权主义、五，诗文通俗主义。^②此种用“主义”来提炼概括古人思想的方法恐怕较之于胡适都更为趋新，难怪有人说此书“为‘平民’二字诠释，立论新颖”！^③

第三个面相则是新文化的主流人物如何选择性地回应地方读书人。一般来说，地方读书人希望得到新文化重要人物关注的心思，往往是希望满腹，却经常落空，尤其是他们对胡适的期待。胡怀琛就曾抱怨：“你（胡适）对我的意见，除了最初给（张）东荪先生一信之外，没有第二句话，却是惹得许多旁人出来和我相辩。”^④像胡怀琛这样期望胡适对其哪怕有只言片语回应的材料，在各方读书人给胡的信中很不少。究其原因，胡适是那样的忙，即使是钱玄同希望他做“思想界底医生”，多打些“防毒针与消毒针”。^⑤但对于《学衡》《华国》等“反新文化主要刊物”，胡适都会“有些爱惜子弹”，更遑论一一去应对源源不断、层出不穷的地方读书人的吹捧或者挑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在“爱惜子弹”的同时，亦希望“开炮要响”。^⑥就国语文学史来说，胡适自家著作的出版绝不会沉默无声，而是要大做宣传。胡适在给钱玄同的信里，就曾兴致勃勃的把广告全文都抄录给他看，其中说道：“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要研究文学史的，要研究国语文学的——不可不读这本书！”^⑦在《新月》杂志刊登的广告里更直接挑明：“本书特别注重‘活文学’的产生与演进，但于每一个时代‘传统文学’也都有详明的讨论，故此书虽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今日唯一的中国文学史。”^⑧

“唯一的中国文学史”的提法，实道尽了胡适想要力压各种其他国语文学史的迫切心情。也正因如此，胡适对其感到有竞逐意味的著述，他则可能要动员各种力量非议之、围攻之。这个竞逐资格的判定要么是质量上的，要么是时间上的，而凌著就是因其“早出”而成为了一个非但未得他承认，且要非议之、围攻之的目标。

余论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既是凌独见一生在文坛的辉煌顶峰，又因得不到新文化主流的承认、而成为了其文字生涯走向籍籍无名的转折点。之后他曾担任过《申报》《杭报》《商业杂志》等报刊的记者和编辑，国民革命到来时，不甘寂寞的他 and 施存统一样也干上了政治，用凌氏自己的话说是“习政事，埋以公牍”。^⑨

实际上，这场革命对他来说，无异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因为他好像看到，借时代变动向上爬升的机会再次降临眼前。1927年国民党“大清党”，当时凌氏颇出了番风头，不仅组织了一个“丁卯国民革命同志会”，还成为了赴南京请张静江赴浙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在浙江省教育会欢迎总司令部军政特派员的大会上，凌氏做演说道：

兄弟生长杭州，而如前月三十一日两工会之大械斗、大流血则从未见过。何以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有此不幸之事，此由共产分子以工会为工具，以工友为牺牲所致。按民生为总理三大主义之一，联共为总理三大政策之一，主义乃目的政策，乃手段，譬如茶饭可以养生，参药更可补身。茶饭可以常吃，而参药仅能偶一尝服，若以参药为茶饭，不仅不能补身，反而伤生。共产党徒自加入国民党后，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① 胡怀琛：《新诗丛稿》，《朴学斋丛书》第3集第1册。

② 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69—71页。

③ 徐兆玮：《徐兆玮日记》第五册，李向东、包岐峰、苏醒标点，1928年12月2日条，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3084页。

④ 胡怀琛致胡适，胡怀琛编：《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下），第43页。

⑤ 钱玄同致胡适（1925年5月10日），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第115页。

⑥ 胡适致钱玄同（1925年4月12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361页。

⑦ 胡适致钱玄同（1927年8月11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398页。

⑧ 《新月》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广告。

⑨ 凌独见：《怎样做人》，再版代序，独见书店，1942年，第3页。

此乃误以手段为目的也。旬前兄弟在《浙江民报》发表几篇党化教育文章，内中最精要的是认我为革命之革命者。兄弟确有此志，确有革假革命之共产党的命之心，丁卯国民革命同志会之组织亦即此旨，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甚盼各界踊跃加入本会，消灭共产分子，一律向右走去，实现救国救民之三民主义。^①

这段话再次证明了，凌氏对变幻莫测之“新思潮”，确实具有天生敏锐的把握能力，但也不得不感叹，一个人自以为能顺应时局，从中取利，却往往多为时局所操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大革命过去后，凌独见在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里摸爬滚打多年，却似并没有脱颖而出，显现峥嵘。“抗战军兴，见以衰落无能，退而习商”，他回到家乡江山办了一个“独见书店”，成为了“安分守己的书店老板”。^②不过“安分守己”也只是凌氏自道。居乡的凌独见还是参与创办了当地的抗日刊物《号角》。并写下了《抗战真义浅释》《中日国运论》《日本绝对不能征服中国》等文章，其以文字经世的心看来并未彻底死去。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当年“非孝”之争中代表学生自治会“审判”过凌独见的施存统“死党”——曹聚仁来过江山，并与凌氏偶遇。渐步入暮年的二人此时一雪前怨，相谈甚欢，他们谈起了年轻岁月的往事，当然也聊到了入共产党，又“脱党”，改名“复亮”，如今回到老家金华做闲人的施存统。^③

追叙前尘，曾针锋相对的二人相视而笑，这笑声中正包含着两个五四青年对二十余年走过之路的感慨。这些感慨说明，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现代转型为凌独见、曹聚仁、施存统这样的“五四”青年开辟了无数条思想上的和生活上的新路，在不断走新路时会感到自身拥有无与伦比的动力与活力，却经常忘了这些经常只是种幻象，个人“只有在反叛的时候，是有力量的”^④，但 20 世纪前半期各种对政治的、文化的和生活的“反叛”虽然层出不穷，如火如荼，但总有其偃旗息鼓、步入常规和被更大、更新的“反叛”席卷之时。正因种种“反叛”不能持续而长久，二十余年间，五四青年所走的条条新路，也就经常变成了回头路与断头路，他们在这过程中重复着从满怀希望到堕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乃至绝望的人生过程，成为了一群崛起于“现代”，却也饱尝“现代”之苦的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化研究(1895—1919)”(11CZS057)，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1PJC043)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张洪彬)

① 《杭州之清党迎张运动》，《申报》1927年4月19日，第7版。

② 凌独见：《怎样做人》，第3页。

③ 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64页。

④ 贺桂梅：《“老太太是一个大的历史现象”：丁玲身上的“五四”、延安、“新时期”》，《南方周末》2015年11月14日。

“Discourse-Loser”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 Ling Dujian and May 4th Time
Qu Jun

Abstract: Whe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developing in various places, it attracted numerous followers to go with the tide. But a vast majority of them were neglected in the dust of history, and became “discourse-loser” of the movement. During a controversy of “against filial piety”, Ling Dujian, a rival of “new youth” such as Shi Cuntong, etc., showed his image of “moral-defender and old-way-sticker” in that historical narration in which the old and the new divides clearly. But, according to Ling’s evolutional trails of his life and mind, he was actually not a young man of “moral-defender”. He kept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of both-for-and-against attitude with the main stream of “New Culture”. Such a relationship deeply revealed the floating fate of non-main stream young intellectuals in the May 4th time.

Key word: New Culture Movement, Ling Dujian, discourse-loser